

【高等农业教育】

从认识社会到改造社会：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行动转向

——基于“清河实验”的思考

郭占锋, 郭悦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中国比较有影响的高校服务乡村社会的历史实践可以追溯到1930年燕京大学的“清河实验”。从进入社区开始调查起,“清河实验”历时九年,从认识乡村社会到改造乡村社会,并以组织建设为切入点,从经济、教育、卫生三个维度实施改造工作。“清河实验”的主要经验为:开展社会调查,认识社会先于实践服务;加强组织建设,构建村庄常规运行体系;链接高校资源,嵌入乡村社会网络。以古鉴今,在当下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在行动层面要把握先“认识”后“改造”的总体路径;注重不同学科优势叠加;并兼顾培养和培育“三农人才”,从而建立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为新时代校地合作提供有效路径。

[关键词]清河实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173(2021)6-0021-14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乡村振兴确立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三农”问题,应始终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全国各级党组织、行政单位、社会组织纷纷响应国家号召,投入到乡村建设的重要行动中来。教育部于2019年印发《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2018—2022年)》,就推动高校深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作了明确要求。2021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支持深入开展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突出高校在乡村振兴中的智力支持作用。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既是政策导向也是时代要求,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高校助力地方社会发展在我国拥有深远的历史传统,最早可追溯到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显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

[收稿日期]2021-10-11

[基金项目]全国农业教指委研究课题“农村发展领域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与运行模式研究(2021-NYYB-4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政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农村发展领域研究生实习效果提升路径研究”(JXGG2170)

[作者简介]郭占锋,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乡村发展。郭悦悦,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代初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和机构在全国有600多个,先后设立了1000多处实验区^[1]。“清河实验”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服务和改造乡村社会的典型代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将认识和服务社会作为办学目标,划定清河镇为改造农村社会的实验区。从组织、经济、社会服务、卫生等方面开始社会改良工作,为乡村建设作出了一系列尝试。但随着抗日战争爆发,持续九年的“清河实验”被迫中断。201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课题组与海淀区政府合作接续清河实验,在清河街道开启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试点,称之为“新清河实验”^[2]。

近年来,已经有部分学者在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社区发展时关注到民国时期燕京大学开展的“清河实验”。在已有考察民国时期“清河实验”的研究中,多将“清河实验”放置在乡村建设运动、乡村治理、乡村社会工作等领域内进行研究。如张学东和齐凤将“清河实验”定义为由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师生举办的一种农村社区社会工作实验^[3]。侯俊丹从“知识治理”的角度审视“清河实验”工作,认为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借助社会学的专业知识塑造群体意识,在以知识社群身份参与地方社会改造的过程中创造出了新型的社会组织化形式^[4]。萧子扬等人梳理“清河实验”的主要内容,总结、借鉴其中的社会治理思想,以启示当下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5]。也有学者单独考察“清河实验”的经济工作、卫生工作等,如彭秀良曾以“清河实验”为主题撰写六篇系列文章,对清河实验概况^[6]、工作原则与组织架构及经费^[7]、经济工作^[8]、社会服务工作^[9]、卫生工作^[10]和经验总结^[11]做了全面的梳理。陈争平和张顺周通过研究清河实验中以发展合作社、合作农场、乡村工商业、农业改良等方式来进行乡村经济建设,对农业现代化问题作出思考^[12]。

以上对“清河实验”的研究,多集中于史料的梳理,为当下的乡村治理、乡村建设提供借鉴。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跳出“清河实验”的实践过程和具体工作,它实际上是一次高校服务和改造乡村社会的有益尝试,未尝不可从高校与社会的互动中去理解“清河实验”。中国大学象牙塔里的一群师生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观察一定时空范围内乡村的历史、地理、生态、人口、家庭、婚姻、市场、经济与经济组织、政治、教育和宗教等,对症下药,充分将高校和社会连接起来,学以致用。“清河实验”虽因日本侵华战争而被迫中止,但一代社科人才在其中体现的经世致用的社会担当和爱国情怀、以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在服务乡村中摸索的经验方法,甚至是其行动本身,对于现阶段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尤其是社科院系服务乡村振兴来说都是一次里程碑式的示范。

从一个更加完整的视角来看清河实验,它应该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清河实验区正式成立前的清河调查,二是清河实验的具体改造工作。清河调查是清河实验区工作开展的前提和基础,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工作应该被放在认识清河实验之前。关于清河实验的具体工作,虽然1931年到1933年是实验区经济股、社会股、研究股和社会股逐渐分离、各自功能清晰化的过程,几个工作体系建立完善的时间前后相差不大,但是从工作思路设计上仍能看出清河实验对组织工作的重视,组织建设又是关系到其他方面开展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本文依次从社会调查、组织建设和具体实践改造来考察清河实验。

二、清河实验:高校改造乡村社会的尝试

(一) 以社会调查认识乡村社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在内忧外患中处于持续衰退状态,为挽救农村的崩溃与破败,不少学术团体及个人纷纷开

展乡村建设运动。在遍地开花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社会调查成为各乡村建设运动的前期基础工作。1936年,燕京大学学生刘育仁在其学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中,粗略估计了中国1927到1935年间全国社会调查共计9027次,呈现出极度活跃的状态^[13]。该阶段对中国乡村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多样,如金陵大学农学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高校组织的农村调查;又如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山文化教育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及华阳义赈总会等私人团体开展的农村调查;除此之外,还包括政府和个人组织的社会调查^[14]。晏阳初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中就强调了对农村社会事实认识的重要性,“农村建设的工作必须有具体的方案。具体的方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事实的根据,又必须靠有系统的精确的调查”^[15]。开展广泛而细致的社会调查成为民国时期各学术团体认识乡村社会的普遍倾向。

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对清河实验的服务工作亦始于社会调查。开展清河实验之前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社会生活的研究为别人所理解,至少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考虑时间要素,社会发展是动态变化的过程,需要确定下来时间区段以便清楚地描述中国社会生活的背景和事实;二是社会事实必须与特定的地区相关,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状况进行解释时,应对不同区域进行一定数量的个案研究;三是必须对事实进行定量分析,掌握一些确定和准确的数据与事实。1928年秋到1929年6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燕大社会学系杨开道开始主持河北清河镇调查,万树庸、余协中以及张光录等人均参与其中,共同完成了对清河镇的人口和组织调查。清河调查目的在于寻找一个适当的地方社会案例,考察它是否能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性质有所反映^[16]。据记载,为了获得关于清河镇的完整和准确情况,杨开道、许仕廉等人着重从四个方面

进行调查工作:整个社区以及邻近社区都必须进行简要调查,为更详细的工作提供充分的背景资料;必须仔细审查现有的各种社区组织,发现它们的结构和功能;必须对家庭和住户进行系统的调查;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要询问,找出他们与数量、结构和迁移等人口问题的关系。其调查工作可谓细致,对于不同的调查对象如社区组织、家庭、店铺,使用了不同的数据收集工具,制定特殊的表格。最终形成了关于清河各方面概况的完整认识,了解了清末民初北京西郊农村地区的变迁过程^[17]。根据杨开道等人的调查研究结果,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为清河地区的改造提供了5条建议,涉及成人教育、儿童教育、医疗、农民销售合作社、道路与排水系统等方面。

1930年6月,“清河社会实验区”正式举行开幕式^[18],许仕廉和杨开道将清河镇的社会调查扩大为燕大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主持的“清河社会实验区”,逐步将清河镇周围四十村纳入,并与赵承信、黄迪等人共同组织学生到清河镇调查。在创办试验区的同时,杨开道与许仕廉合作完成《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Ching Ho: A Sociological Analysis)。这是燕京大学社会学从事社区研究,并将之与社会改良事业结合起来的开端,也是通过社会学的田野工作,改造乡村社会的实质性探索。

(二) 以组织建设实现服务对接

一个村庄想要在繁杂的事务中有效地运行,必须要有一套相对科学的组织架构。清河实验区涵盖清河镇及其附近40个村庄,且这些村庄分属3个不同的县,为保证清河实验工作的顺利进行,清河实验区在成立之初即实行委员会制,管理工作由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派遣的执行委员会负责。后来经过实验区协商,于1931年改为主任制,由一名主任来负责实验区的所有管理工作。张鸿钧教授担任清

河实验区的第一任主任,之后,杨开道和王贺宸先后继任主任一职。1930年到1933年,经过不断地完善,整个实验区逐渐形成了三层组织结构。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系统筹管理整个实验区工作,下设执行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设主任一人,会计一人,四股股长各一人,每股股员三四人不等,执行委员长常驻清河;顾问委员会之下又分设小本贷款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合作委员会、毛织业委员会、旬刊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以及研究委员会,开会周期为两个月一次^[19]。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顾问委员会多由本地人组成,其中吸纳了当地的绅商代表,还包括一些热心赞助实验区的外部人员^[20]。

实验区执行委员会根据具体工作内容划分经济股、社会股、卫生股和研究股,经济股负责农村合作、农业技术推广、乡村工业和小本贷款等工作;社会股负责社会教育工作以及儿童、妇女工作;卫生股负责环境卫生、卫生教育宣传、防疫统计及医务等工作;研究股则负责试验区人口、家庭、组织等情况的调查工作。四股工作内容相异、各有侧重,但在实际工作中仍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三级的组织结构运转下,实验区到1933年共有17名专职人员,4名兼职人员,还有社会学系实习学生,“现正实习者,男女学生23名,每星期来区4小时至8小时不等”^[21]。在此时期,清河的组织机构体系基本形成。

由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设计的这一组织架构,将各种资源和要素纳入进来。一方面,燕京大学作为最高一级的管理和服务主体,充分利用科学研究成果和实习教育机会,集中发挥高校智力、人才优势,为清河实验区的建设供给了高质量的社会服务人才;而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本身具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也在清河实验区建设中发挥作用。1934年,燕京大学成立农村建设科,将政治、经济、社会、教

育、家政、化学、生物等系所有有关农村的研究和工作集中起来,各系通力合作来了解中国农村和参与乡村建设^[22]。另一方面,清河实验区成立之初,就制定了一项基本工作原则,倡导聘用当地人才,在每一种具体工作实验成功后均移交给本地人,并将其安排到实验区的组织管理工作中。燕京大学还与清华大学、香山慈幼院合办农事讲习所,目的在于造就农村领袖、垦殖先导、农事推广员、新农民,修业期限为3年^[22]。在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所写的报告中指出更进一步的目的在于七年后将清河实验区建设成为一个华北模范示范市,使得当地人民能自行承担起所有的社会事业^[23]。可以说,燕京大学在改造清河之初就做好了撤出清河的准备,高校在乡村服务中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作为外来力量要帮助乡村社区生成其得以存续的内在力量,如若不然,这种服务和改造工作对于村庄社区的发展而言则缺乏可持续性。

(三)以“三维”实践改造乡村社会

1. 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

民国时期相当一部分乡村建设实验是以开展农村教育事业为着力点,例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开展的“四大”教育工作;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镇江黄墟、浙江绍兴善庆等地建立了十余处农村试验学校^[24];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黄巷建立实验区,欲两年内普及教育,完成地方自治,同时产生最实用的教材教法^[25]。与此不同的是,农村的经济建设被作为清河实验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前期的社会调查,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系主任许仕廉得出,“当此生计艰难之际,农人对任何事情,先在钱的方面着想;农人生活之中心思想,在如何方能在其地土出产上多赚些钱。职是之故,吾人须极力设法由经济方面改良乡间人民生活”^[20]。

基于此,实验区开始了以兴办合作社、

成立合作农场和发展乡村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乡村经济建设。清河实验区研究股所调查的40个村庄4900户的负债情况中,负债者有756户,占总户数的15.5%,高利贷成为农村经济建设的一大阻碍。此外,农民生产资料缺乏,脆弱性明显,袭用旧法,农业技术上不知改良,且不能合作,无法进行对于水旱虫害灾荒的预防与救济^[26]。因而实验区把经济工作落脚点放在农民之间的合作互助上,并不断扩大农民的合作事项。从小本贷款开始,1931—1932年前后共贷出3519元,分配于234户,由于小本贷款不利于农民的合作,之后将重心转移到兴办信用合作社上。1930年底,清河实验区第一个合作社在唐家岭村成立,自此到1936年,实验区共指导建立了29个合作社。在29个合作社中,有18个合作社仅经营信用业务,7个合作社兼营消费业务,兼营合作农场的合作社有4个,另外还有1个兼营仓库的合作社^[27]。信用合作社通过开办储蓄业务获取资金;在信用放款上,34.6%借贷给个人,65.4%借贷给兼营合作商店和合作农场的合作社。为对合作社进行指导和监督,1934年7月,唐家岭、西小口、黄土北店、卢家村等村在商议后成立了“清河合作社联合会”,合作联合会成立后逐渐取代燕大所办合作社指导部的职责,成为本地组织。与此同时,合作农场是清河实验区经济工作的另一重要事业,主要进行农业品种和技术的指导推广工作,促进农业增收。东北旺村于1931年首先成立合作农场,主要种植薄荷。为了支持合作农场的发展,实验区经济股向其贷款200元;办事处聘请专家指导培育技术和养护方法,共种植13亩,年净收益达到229元。之后邻村开始效仿,到1935年前,共4个合作农场在清河实验区成立:东北旺、西二旗,黄土北店和卢家村。通过合作农场的方式,成功改良了清河一带相当数量的盐碱地,种植了一批高风险、高收益的经济作物,进行了猪鸡的品

种改良^[26]。清河实验在经济建设中的另一尝试是面向家庭中的青少年女性劳动力,指导发展了包括毛纺织、土布印花、手织地毯和挑花以及制造花生酱在内的乡村产业。1932年9月初,为引进毛织技术,实验区选派两名学生到华北工程学院学习,学成后由实验区开办兼具培训和工厂生产双重功能的“家庭毛织业训练班”,由两名学生对村民进行培训,村民毕业后可选择继续留在训练班做工或领原料在家工作,收益显著增加。当地农村妇女通过实验区所提倡四种乡村工业,每人每月工作可赚到5~7元^[28],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一项补充。

2. 开展乡村社会教育

192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主任许仕廉经过实地调查,发现清河不识字的人占当地人总数的69.7%,儿童入学率低,报纸也极少。而且当地也没有平民教育的设施,同时,民众的业余生活单调乏味,妇女尤甚^[29]。杨开道等人在清河的调查显示,30.3%的人口会读写,男性的比例更高,为55.5%,但清河只有4%的女性可以被称为有文化。儿童受教育的数量非常少,在调查的194人中,只占45.4%,也很少有人关注成人教育的问题。因此实验区社会股大力开展以社会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服务工作,对象主要是儿童和妇女。

实验区的社会教育工作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成立了一些教育性质的社会组织 and 训练班。如为了保证儿童受到良好的教育,实验区于1930年夏成立了儿童会;1931年3月,成立清河镇幼稚园,6岁以下的儿童均可入学,之后分别在黄土店村、八家村、三齐村也开办了幼稚园;1932年9月,设立幼女班。除普通课程外,还开设了缝纫、刺绣等课程。对于妇女的教育工作,主要内容为扫盲和提高生产技能。针对当时广大农村妇女不识字、生产技能薄弱等现状,1931年实验区设立女子手工班;同年2月,面向15岁以上女子成立了

家政训练班,设置烹饪、缝纫、家庭布置、食物选择等课程。此外,实验区还成立妇女俱乐部,到1933年,有55人加入。除了生产生活技能之外,还教授读书和写字^[9]。二是实验区致力于社会教育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为方便阅读,设立了图书馆,个别合作社附设阅报处、办壁报,帮助农民在忙碌间隙,花费更少的时间,得到最关键有用的信息。据资料记载,实验区花费15美元为儿童图书馆购买了170多本书,被40个村的儿童相互传阅^[30]。燕京大学体育系还帮助建设了篮球场,为农民户外运动创造条件,丰富农民业余生活。这些活动对于当时的农村地区而言,充分激发了农民兴趣、增强了集体意识。可见,“清河实验”开展的社会教育既包含了对文字的基本普及,也包含了对妇女其它生计的训练,还注重丰富的娱乐活动,且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均将教育工作融入农民的实际生活中,充分地尊重了乡村的生活秩序。

3. 提高乡村社会卫生水平

清河实验区最初的卫生工作附属于社会股中,由于民众看病需要和实验区卫生工作需要,1932年7月,成立了组织完善的独立卫生工作部门,下设医务总务、环境卫生、卫生教育、保健、防疫统计等六个组,各自都有相应的职责范围。总务组负责文件保密,与其他机关合作;保健组负责学校卫生、孕妇婴儿健康会、助产工作、产婆训练班、工厂卫生;防疫统计组负责预防注射、人事登记;环境卫生组负责街道清洁、水井与厕所调查、一般环境卫生工作;卫生教育组负责母亲会、文字图表宣传、卫生运动与演讲;医务组负责门诊治疗、乡村治疗分诊所、医院^[31]。

清河实验区卫生股成立后,除了正常的工作事务之外,经常组织一些卫生教育和宣传活动。为方便农民看病,实验区于1933年春建成医院;后来,因实验区所辖村庄范围大,进一步成立了三个分诊所。然而由于乡村民众千百年的观念和习惯,

当地居民对西医、住院、手术等不信任,在女性生育方面也给助产工作造成相当大的阻碍,此种情况下,医院未能发挥原本的功能,逐渐成为农民拿药的诊所。习惯认知与新事物、新思想之间的冲突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弭的,“清河实验区”卫生股在乡村地区传播现代卫生知识过程中,新、旧思想的冲突转化为具体工作中高校与村民间的现实阻碍,但实验区的卫生股一直根据当地情况调整工作办法,以促进学院派的知识与乡土知识的融洽互动。例如,实验区为开展助产工作宣传,于《清河旬刊》上刊登“实验区1933—1934年接生120多个,均获安全。人民信仰西法产者日深,因之请求助产者日多。又医院设有产妇科,置有产床数张,设备完善,乡民称便”的文字^[32]。在宣传新法接生的同时,组织产婆训练^[33]。此外,为在民风保守闭塞的情况下开展环境卫生工作,实验区与当地小学合作,促进学校卫生工作,如于1931年夏组织清河小学通过张贴标语、进行卫生演讲来发动减蝇运动,取得了较好效果;与商会、当地绅士、公安分局等合作举办卫生运动大会。值得注意的是,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在进行卫生工作以及其它工作时,时常会从乡土社会的传统权威组织中寻求支持以取得民众的信任。村小学、镇小学就是典型的代表,在传统社会里,一个村庄的小学是正式教育的场所和官方知识的重要来源,正是出于对这一乡村社会事实的深刻认识,小学、商会等成为“清河实验”组织和动员乡村社会的有效载体。

三、燕京大学服务乡村社会的特点与经验

(一) 开展社会调查,认识社会先于实践服务

清河实验是燕大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在这一历史时段中基于不断累积的对社会事实的观察,融合多学科专业而推进的

综合性社会改良工作,其中的清河调查是一次以清河镇为中心的长时段区域性系统调查^[34]。它与清河实验相辅相成,为改良工作提供关于农村社会的基础性认识。清河调查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阶段性,调查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清河实验正式开启前,杨开道、许仕廉等主持的清河镇概况调查,成果如许仕廉1929年以英文完成关于清河现状的调查报告,后于1931年用中文以《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为题在《社会学界》杂志上发表;杨开道、许仕廉等合著的英文报告《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以及1929年李景汉完成的中国最早关于家庭调查的报告《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2)1932—1935年间,万树庸的黄土北店村调查、蒋旨昂的卢家村调查,实验区于1931年10月成立研究股对毗邻清河镇的昌平县调查,以及张折桂、邱雪娥对清河镇礼俗的调查和刘志博对北平的印子钱调查。此外,燕京大学教师每年带着学生到实验区实习一个月,撰写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二是社会科学领域多个相关专业的合作进行调查研究,除了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内部知识群体的活动外,1929年戴乐仁本人^[35],以及指导经济学系学生对清河集市进行了研究^[36];在杨开道转任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后,学科间合作得到加强,杨开道将燕大社会、政治、经济三系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37]。清河调查成为清河实验工作的重要支撑,清河实验区也成为燕京大学的重要研究基地。

清河实验开展的工作内容,针对当地经济、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问题设计的工作方案都是建立在详细社区调查的基础上。以调查为纲,以实际为依据,尝试站在农民和农村的立场之上,为清河农村的改造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而这种注重实地调查,自下而上的服务思路,无论是对现在高校服务乡村建设的实践还是地方基层政策的执行,都具有借鉴价值。高校如何将自身的知识与人才下沉到乡村的发展实际

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高校了解乡村需要什么。例如,当地土地适合种植什么种类的农作物,农民需要哪些方面的服务,农村常住人群的特征等。了解一个乡村小社区的微观社会样态,是做好服务工作的第一步。

(二)加强组织建设,构建村庄常规运行体系

中国乡村未来发展的根本出路和关键着力点在于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培养上。以家本位为基础的中国农村社会,必须扩充出“社会”的空间,构建一个适合中国特殊民情条件的农村社会组织^[38]。清河实验十分强调发挥人民群众的自我建设能力。在经济层面,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和合作农场;在政治层面,实验区执行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有大量本地人参加;在社会服务工作中,成立了自组织、儿童会、母亲会等,提高清河本地人在社会组织建设中的参与度,保护儿童妇女权益。此外,清河调查研究发现,在农民遇到困难时总是首先寻求社区有威望的骨干居民的帮助,也就是社区领袖,因此实验区在清河实习生选择农村学生进行培养,培养本地农村的社区领袖。

1943年,晏阳初与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交谈时提到,“你没有必要把这些人从他们的环境——农田中带走,而应该就在农田教育他们。这样你就用不着在学成后把他们再送回来,因为他们始终就在农田里”^[39]。清河实验区在服务乡村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组织架构,并且努力将本地人纳入其中,厘清了村庄中各个主体、各项事务的位置和功能,建立了一种常规机制来保证实验区工作的正常运行。在具体事务上,也倾向于将农民组织起来,降低风险,共享生产生活资源。高校在乡村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即帮助激发农民主体性,培养其参与社会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引导其组织与合作意识;进而不但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能获得自主发展能力,并

且在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框架内,亦能争取自身的发展权益。这种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能力是衡量高校服务乡村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

(三) 链接高校资源,嵌入乡村社会网络

清河实验并非仅依靠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的力量,而是以该系为中心构建了服务清河实验的支持网络。1933年,在司徒雷登的敦促和指导下,燕大院长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乡村建设问题,包括:对燕大的课程进行调查,了解现行课程对乡村建设的作用,发现其中的缺点并加以改正;计划各系如何设置与乡村建设相关的课程;与其他乡建机构合作等^[40]。根据史料,从经费来源到经济卫生教育等工作,都积极以高校为中心链接社会资源。首先在经费上,美国罗氏基金为实验区提供了启动资金,起初实验区每年所需的七八千元经费,一半由燕大提供,一半由私人赞助^[41]。其次,善于调动燕京大学其他院系的力量,如清河实验区篮球场由体育系建造;农业种子由学校农事试验场改良,并联合举办农产品展览会等。再次,清河实验在实施过程中也积极从外部发掘多种资源。实验区筹办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信托社等受到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的支持;在手工副业上,北平华北工程学校为清河镇培养了一批毛织人才,增加了额外的收入;在医疗卫生方面,积极开展与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事务所、北平第一产婆学校、协和医院等的合作;此外,还与商会、区公所、军政部织呢厂等共同翻修清河大街道。最后,实验区也注重利用地方社会的政治资源,与官员、当地士绅以及各村村长共同推动实验改良^[41]。这些资源的整合,有力地推动了清河的经济、社会、卫生等事业发展。

结合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情况来看,中国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资源差异大,普遍面临资源短缺、支持网络匮

乏以及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高校作为国家资源的重要投放地,除去其本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人才优势,高校与社会经济部门、政府部门、卫生部门等都有一定联结,在社会资本网络中处于关键位置。因而,高校有能力有资源为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提供助力。但高校在进入农村社区时,依然会受到一定的排斥。清河实验区初期开展的社区调查也受到过民众的质疑,“常被居民误会,谗以闭门羹,或是故意放出恶狗去咬那调查员”^[30]。高校除了引自身资源入乡村外,还要“入乡随俗”,即整合村庄社会资源,如基层干部、有声望的乡贤以及文本以外的村庄文化、地方性知识,来更好地推动工作的实施,取得农民的信任。乡村与高校本身都有一套社会资源网络,二者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应各自社会场域而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应当互相尊重,相向动态磨合,将各种可利用的资源都梳理衔接到一起,纳入乡村振兴的工作实践中来,这是高校服务乡村的关键一环。

四、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行动转向

(一) 从认识社会转向改造社会

清河实验中,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的工作思路非常清晰,遵循了从认识社会到改造社会的总体路径,这条路径对于当下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来说依然具有借鉴意义。高校到乡村中实践,应该首先开展认识乡村社会的活动,否则高校的服务与乡村的需求必然会出现偏差和错位,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乡村,不但无法达到其预期目标,甚至可能出现矛盾与冲突。

认识社会的基本方法是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并非做问卷,即使是问卷设计,也大有学问,需要相关学科人员在理论与专业指导下进行。社会科学中一些学科的特点更善于认识社会,如社会学、人类学等。再者,人们的人际关系、社会行动与意义网络发生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的交织中,全面且客观地把握社会事实和理解社会问题

需要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的紧密结合^[42]。因此,认识社会可以从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开始。总的来说,在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上,应始终结合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做出有质感、生动的社会调查报告。从社会调查中把握社会事实,全方位了解乡村社会的情况,高校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服务社会计划。改造社会的内容应该至少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建设和组织建设等乡村软实力的建设,帮助乡村建立紧密的社会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组织架构,增强村民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二是进行经济建设、教育建设等关乎乡村发展的建设,包括农业技术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技能培训等能提高乡村实际生活水平的方面。两种服务分别需要高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的合作推进(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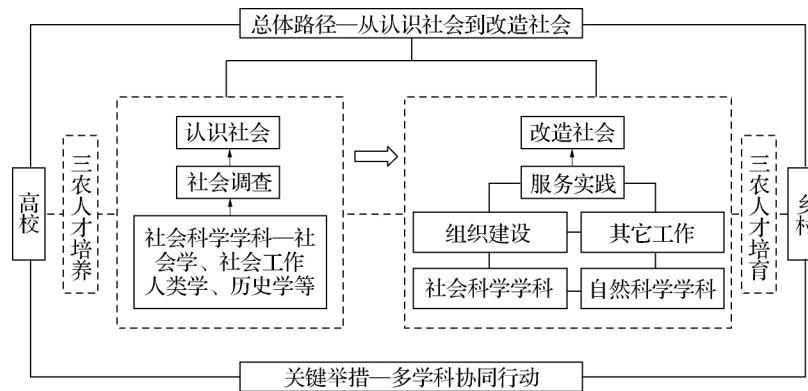


图1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行动转向

认识社会与改造社会并非一前一后的断裂关系,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共同向前发展,形成良性循环。首先,认识社会推动社会改造的前进。调查工作在整個乡村振兴服务工作中应保持在场状态。在高校服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通过社会调查方式进行剖析,克服阻碍,推动乡村建设工作的持续进行。其次,社会改造推动认识方法的创新。在实践过程中有利于丰富社会调查的方法形式,扩展认识社会的维度,积累关于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经验。在当下,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广泛,而乡村振兴又是我国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战略任务,社会科学应该积极研究服务乡村振兴的方法,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工作提供支持及新的路径选择。

(二) 从单一学科介入走向多学科协同

在同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金陵大学农村建设实验站主要由农学院负责实

施;北平师范大学以教育系为主;南开大学以经济研究所为主。而“清河实验”在其认识乡村社会到改造乡村社会的两个阶段中,注意打破学科界限,整合学系进行沟通与合作,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表现出鲜明的多学科协同特征,其中又突出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自然科学学科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结合。

以往校地合作的实践,常规模式多为单一学科服务乡村社会的单一领域,例如,农学指导农业科学发展,经济学关注农村产业结构,法学重视乡村法治建设等。但乡村社会是一个结构复杂、要素多样的整体,乡村振兴要实现的是全方位的发展和体系化的推进,因此它需要一种承认多重因果关系、多重目标和多重干预的多元主义模式。也就是说,乡村社会本身的复合性决定了为其提供服务的主体亦应该是一个具备多元知识体系的行动共同体。现代高校在学科和专业设置上门类多样,既有

研究社会现象与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也有研究自然中有机或无机事物、现象的自然科学学科,高校本质上是一个多元知识综合体。那么关键的问题即是在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能够从单一学科介入转向多学科协同合作。

结合“清河实验”的经验来谈新时代高校服务乡村振兴中的多学科协同,前面已经提到,需要帮助村庄实现两个层面的建设:一是乡村的软实力建设,二是村庄的硬实力建设。前者是社会科学专业更具优势,后者则更需要依赖自然科学的力量。但二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一方面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基础,后者使前者的静态组织结构运转起来。这也进一步证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乡村振兴中的关系最终是统一的。另一方面,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静止的,能够在互动中各自实现发展。在高校的具体工作实践中,组织建设为高校的专业技术和人才支持提供良好的社会组织基础,使得各项具体工作更有效率地进行;同样,乡村硬实力建设能够及时矫正村庄组织结构的不合理部分,此时则又推动乡村软实力的建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分别作为村庄软实力建设和硬实力建设依赖的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也互为补充,共同发展。因而高校要服务乡村振兴,帮助乡村进行组织建设和经济、教育建设,必然需要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两类专业知识、人才的共同参与,缺少任一部分,服务工作都是不完整的。组建一个综合的学科人才服务队伍是新时期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方式。

(三) 兼顾高校“三农”人才培养与地方人才培育

许仕廉于1926年发表《燕大社会学系教育方针商榷》的演讲中,就强调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指出“养成社会观念、地方精神和国家思想”是社会学教育的目的^[43]。1930年,许仕廉担任系主任,制定了更为明确的教育方针,“在社会服务工作方面,

提出培养高等社会服务专门人才,设立速成社会服务科,培训在社会服务机关工作的在职人员,特别注重社会调查,使学生明白中国现时社会情况,掌握搜集科学材料的方法,教育上以结合本国实际为主”^[44]。重新认识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的办学目标和办学方针,可以看到它至少发挥了两项职能:一是为社会服务机关输送专业的社工人才;二是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大学最终成为“兵工厂”,不断地为社会输出技术与管理专家,这也是燕京大学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45]。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注重“三农”人才或社会服务型人才培养是更为长效的服务机制。现代高校承担的三大职能即是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其中,人才培养作为首要职能,培养什么样的人对于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但现在的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在大多数的专业培养中,缺乏有效的、稳定的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教育,部分涉农高校亦存在此类问题。对于学生而言,脱离实践的学院式教育不但使其缺乏社会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更在步入社会时出现学校—社会过渡的断裂期,这无论是对于乡村社会还是整个社会发展都有抑制作用。对于现代高校来说,除了短期内为乡村建设提供某种服务工作,更要将眼光放在人才培养尤其是“三农”人才培养中,将社会服务精神贯穿到整个教学工作中,培养社会服务型人才,为乡村振兴和整个社会发展积累人力资本。

同时,高校拥有各种专业的学科知识、资源和人才储备,但是促进高校资源在乡村社会落地、被乡村社会吸收而不会产生不兼容现象,必要的一步是实现高校科学知识 with 乡村社会地方知识的结合。斯科特的一系列研究中,建立了一种观察农民社会的底层视角,他认为底层社会自有一套知识体系,要从农民社会的内部去观察和

揭示农民的行为及其意义^[46]。高校服务乡村振兴也是如此,村民不是一群抽象的均值人,乡村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具有异质性的丰富生活意义的社会实体,乡村有自己的语言符号、行动规范、价值观念。因此在高校资源对接乡村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去了解乡村的地方性知识,以适合当地的形式促进自上而下的资源下沉;另一方面要培育能够自下而上承接资源的乡村“三农人才”,发挥乡村、村民的主体作用,激发其吸纳、利用以及转化资源的主动性。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合阳县扶贫工作中创建的校地深度融合、整县域定点帮扶的“三团一队”模式,一方面,高校选派了20个二级党委书记组建“书记帮镇助力团”、168名农业专家组成的“专家教授助力团”、15名优秀在校研究生组成“研究生助力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发挥本土人才优势,选派乡村干部、一线技术骨干组建“优秀人才先锋服务队”,与“三团”开展对接联络,实现“输血”和“造血”同步推进,形成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大合力。

五、结语

本文基于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从分析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开展的“清河实验”入手,发现燕京大学改造清河地区的实践中,体现了从认识社会到改造社会的过程。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通过专业的社会调查知识与技能,在开展实验工作前,对清河地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考察当地的自然、经济、教育、卫生、社会组织等,试图对清河地区形成完整和准确的认识。针对当地的情况,改造清河社会。改造工作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组织建设,建立了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执行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经济股、社会股、卫生股、研究股的三层组织架构,从横向和纵向将实验区的各项事务和人员组织起来,为

其它工作的开展提供组织基础;二是经济、教育和卫生工作,社会学系推动兴办合作社、成立合作农场、发展乡村工业,促进清河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通过成立儿童会、幼稚园、家政训练班、妇女俱乐部,完善教育基础设施等,提高儿童和妇女的知识力和生活技能;成立专门的卫生部门,分组负责,开展现代卫生知识宣传和教育工作。梳理、分析清河实验的实施过程,发现其服务社会的工作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开展社会调查,认识社会先于实践服务;第二,加强组织建设,构建村庄常规运行体系;第三,链接高校资源,嵌入乡村社会网络。

对比现今大多数“学院派”的研究工作,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没有停留在认识社会的层面,敢于尝试,从认识社会迈入改造社会,进入到了行动层面;在进入社会实践、社会服务中时,发挥了社科专业的自身优势。以此启发我们当下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在行动层面要注意三个转向:一是从认识社会转向改造社会;二是从单一学科介入转向多学科协同;三是兼顾高校“三农”人才培养与地方人才培育。同时,结合我国高校服务地方社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高校、政府以及相关从业人员都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与践行。

(一) 倡导学术改造乡村社会的历史使命

在杨开道的乡村建设思想中,格外重视专家学者在乡村中的作用发挥。他认为“专家”领袖以及在“专家”影响下生成的地方小知识分子能够真正进入农村社会,将其与整个世界体系勾连起来的中间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河实验是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主导的一场知识分子组织运动^[47]。本文所言的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其中的关键部分在于知识分子如何搭建高校和乡村社会之间的桥梁。二十世纪的中国,在民族存亡的威胁和激烈的社会

变迁中诞生了一批极具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担当的知识分子,不仅有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者,还有以费孝通为代表的魁阁学者,他们身体力行,关注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并接,从经济实践、社会组织和社会心态三个方面展开对乡村社会转型的分析与实践,取得了不俗的成果^[43]。因此,当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涉农专业的专家学者,应该重拾一种深切关怀社会的学术志趣,走出象牙塔,将书本知识与当下的社会联结起来,回到社会中去,理解真实的社会,服务乡村振兴。

(二) 组建振兴乡村的多高校、多学科服务共同体

《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中提出进一步建立全国及区域性的高校乡村振兴科技服务联盟,形成多区域、多高校、多领域、多学科协同参与的乡村振兴服务新局面。过去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方式,呈现出个体化和自发性的特点,行动单位通常为个别高校或高校内的个别专业,极少有跨学校和跨专业的合作。这种服务形式效果有限,且较为零散,对于一个特定区域来说,不利于统合各种有效资源实现优化配置。

2017年,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南开大学等全国8所高校,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四川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等22家研究院、企业和创意农业合作社以及行业组织发起成立了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这对于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方式来说,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在当下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建立乡村振兴科技服务联盟是一条路径;除此之外,可以积极探索其他形式的多学科与多高校合作,例如以特定区域为中心的地域高校联盟,以农业技术、农村社会治理等为主题的专业联盟,以及以多专业合作为导向的乡村振兴实验基地建设。总之,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积极发挥主导

作用,与高校进行深度互动,建立服务乡村振兴的高校资源网络,帮助形成助力乡村振兴的多学科、多高校共同体。

(三) 建立良好的校地关系及其合作机制

高校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高校研究的领域是社会领域,培养的人才最终也回流到社会中去;同时,社会也为高校提供相应的资源,高校与社会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理应是紧密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高校的科研源于社会,但又有高于社会的学术倾向,一直以来,高校具有这种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持其学术研究和教学自由的历史传统,且这种传统作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存在。高校的教学活动和科研活动偏重于发表科研论文、出版著作、晋职称等,轻视其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此种发展现状已然影响到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发挥。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中,明确提出了支持高校聚焦乡村发展热点问题,不但包括乡村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农业生态、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等议题,还包括农耕文明与乡村文化、村庄民生等理论与政策研究。由此可见,各个学科专业在乡村振兴中都有施展的空间,社会科学相关专业更应该重视自身的角色,充分展开与社会的互动,生产更多具有应用价值的知识。

因此,从高校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乡村振兴的战略实际来说,开展校地合作对地方社会和高校自身均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探索校地合作的有效机制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现今,已有不少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了乡村振兴研究院,如中国农业大学钱江源乡村振兴研究院,围绕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开展研究,助力乡村振兴理论、实践、制度创新。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校地合作,在厘清政府和高校各自角色定位的同时,应时刻以研究乡村社会、服务乡村振兴为行动的宗旨;走出高校的大门,将乡村作为研究的田野和服务的对象;从

乡村社会中去收集一手资料,从一手资料中探索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实践机制和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崔军伟,孙念超.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活动述论[J].农业考古,2012(1):315-319.

[2]李强,卢尧选.社会治理创新与“新清河实验”[J].河北学刊,2020(1):175-182.

[3]张学东,齐凤.近代“清河实验”及其“学院派”社会工作风格[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5):12-16.

[4]侯俊丹.制度变迁下的知识治理:早期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J].学海,2017(5):95-102.

[5]萧子扬,马恩泽,石震.乡村振兴背景下“清河实验”社会治理思想的再研究(1928—1937)[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70-80,109.

[6]彭秀良.清河实验(一):概述[J].中国社会工作,2015(22):58-59.

[7]彭秀良.清河实验(二):工作原则与组织架构及经费[J].中国社会工作,2015(25):58-59.

[8]彭秀良.清河实验(三):经济工作[J].中国社会工作,2015(28):59-60.

[9]彭秀良.清河实验(四):社会服务工作[J].中国社会工作,2015(31):59-60.

[10]彭秀良.清河实验(五):卫生工作[J].中国社会工作,2015(34):58-59.

[11]彭秀良.清河实验(六):经验总结[J].中国社会工作,2016(1):57-58.

[12]陈争平,张顺周.北京农业现代化的先声——民国时期清河经济建设实验概述[J].北京社会科学,2013(3):143-149.

[13]刘育仁.中国社会调查运动[D].北京:燕京大学,1936.

[14]杨鹏.民国时期农村调查热潮研究[J].求索,2016(3):178-182.

[15]晏阳初,宋恩荣.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02.

[16]许仕廉.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度报告[J].社会学界,1930(4).

[17]杨开道,许仕廉.Ching Ho: A Sociological Analysis[M].北京:燕京大学,1929.

[18]许仕廉.清河社会实验工作[J].村治,1933(2/3):3-4.

[19]许莹涟,段继李,等.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M].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5:734.

[20]许仕廉,清河农村社会中心区[J].河北月刊,1933(2):1-13.

[21]章元善,许仕廉.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M].上海:中华书局,1934:68.

[22]颜芳.论燕京大学乡村建设实验及其现实启示[J].教育史研究,2009(5):38-42.

[23]子厚.燕大社会学系近况调查[J].社会学界,1931(5):37-56.

[24]胡明,盛邦跃.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与无锡乡村民众教育实验区[J].教育评论,2010(1):149-151.

[25]杨骏昌.清河合作[D].北京:燕京大学,1935:8-12.

[26]王贺宸.燕大在清河的乡建试验工作[J].社会学界,1936(9):360-362.

[27]邓淑贤.清河实验区妇女工作[D].北京:燕京大学,1935.

[28]许仕廉.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J].社会学界,1931(5):1-10.

[29]光录.到清河镇去[N].北京晨报,1934-07-07.

[30]中国乡村卫生机关调查概况[J].中华医学杂志,1934(9):67-85.

[31]湖北地方政务研究会调查团.调查乡村建设纪要[Z].武汉:汉口国华印刷公司,1935:298.

[32]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秘书处.一年来复兴农村政策之实施状况[Z].南京,1934:296.

[33]侯俊丹.市场、乡镇与区域:早期燕京学派的现代中国想象——反思清河调查与清河试验(1928—1937)[J].社会学研究,2018(3):193-215,246.

[34]Li Y, J B Tayler. Grain Marketing in Hopei Province: An Interim Report [J].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33(1).

[35]王贺宸.燕大在清河的乡建试验工作[J].社会学界,1936(9):360-362.

[36]李守经,邱泽奇,杨开道[M].北京: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337-338.

[37] 萧子扬. “清河实验”: 当代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J]. 世界农业, 2017(7): 184-188.

[38] 宋恩荣. 告语人民[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317-318.

[39] 燕大院长会议记录(YJ32003, 英文)[A]. 北京大学档案馆, 1932-1934.

[40] 孔雪雄. 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Z]. 南京: 中山文化教育馆, 1934: 439.

[41] 郭台辉. 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之维[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8): 45-64, 205-206.

[42] 许仕廉. 燕大社会学系教育方针商榷[Z]. 燕大周刊, 1926: 6-8.

[43] 许仕廉. 燕京大学社会学面面观[J]. 社会学界, 1933(7).

[44] 雷洁琼, 水世琚. 燕京大学社会服务工作三十年[J]. 中国社会工作, 1998(4): 39-40.

[45] 王晓毅, 渠敬东. 斯科特与中国乡村[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279-281.

[46] 侯俊丹. 乡约改造与专家治理——简析杨开道的乡村建设思想[J]. 学术交流, 2016(2): 152-156.

[47] 何根海, 张勇. 校地合作共建视野中政府与高校的角色定位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09(9): 62-64.

(责任编辑: 李良木)

From Understanding Society to Transforming It: Action Reorient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erving Rural Rejuvenation: Thinking Based on the "Qinghe Experiment"

GUO Zhanfeng, GUO Yueyue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latively influential universities serving rural societ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Qinghe Experiment" of Yanjing University in 1930.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mmunity, the "Qinghe Experiment" lasted nine years, from understanding rural society to reforming rural society, and starting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the reform was carried out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conomy, education, and health. The "Qinghe Experiment" can be empirically summarized as follows: to carry out social surveys, to understand the society before practical services; to strengthen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to build the village's regular operation system; to link university resources and be embedded in the rural social network. Learning from the past,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erv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we must grasp the overall path of "understanding" and then "reform" at the action level, focus on the superposition of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give consideration to cultivating "agricultural talents" all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viding an effective path for school-local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Qinghe Experiment; Understanding Society; Transforming Society; Rural Revitalization